

■彼岸

看老美超级杯 估春节经济价值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2月4日是美式足球超级杯的赛日,正好《福布斯》杂志在此之前评选出全球最有价值的体育盛事,美式足球超级杯名列榜首,第二名是夏季奥运会,第三名是世界杯。在前10名中,7名是在美国举行的赛事。

按《福布斯》的说明,体育盛事价值计算以天来计算,比如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应该是收入更多,但北京奥运会为17天,因此以天来计算价值,夏季奥运会比不过美式足球超级杯。当然,对于这样的排名,可以发现,美国人是多么想充当世界第一,但也不得不承认美式足球超级杯赛所反映出的美国文化和经济上的一些特性。

众所周知,美国有最多的跨国公司,许多商标全球驰名,许多公司都在上百个国家有商业活动。毫无疑问,这些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市场经营,但超级杯的商业价值却说明,国家经济的强大更在于国内的消费市场。美式足球完全是一项美国国内运动,没有国际性观众,因此,其商业价值基本上来自于美国国内市场。美国将美式足球定义为第一大球,并有最大的体育盛事的商业价值,可见美国市场的宏大和深厚。另一方面,美国人几乎拒绝了全球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即英式足球,也正是因为美国人对足球的冷淡,世界杯才没有名列榜首,这也是为什么国际足联一直想在美国市场上突破的原因所在。

美式足球在美国的龙头地位就是这样凸显出美国例外主义的特性:你们玩的,我们不玩,你们不玩的,我们要玩到最大。当今时代,文化和娱乐就是经济,没有经济的支持也就没有文化和娱乐,文化和体育发达的国家,经济一定发达,当然,经济发达的国家,不一定有发达的文化。当今的文化和体育已经不是过去的消闲和竞技的概念,而是生产力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发展的文化不仅有精神符号上的意义,而且还是

……具备不具备“封建”特征?内耗不止、资源流失、粗放增长、边效递减、“系统腐败”、“区域腐败”,特别是刘青山、陈希同、陈良宇之辈,像不像严嵩、和坤、年羹尧?再看看恶名远播的假棉毒米以及“农凯”案、“基金黑幕”案、“社保”案,等等,各位也许就会更能明白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力量的支配下,或者说是背负着这种历史的重压,而走过来的。也许,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还会继续在这种历史的重负下走下去。

“未出山时便有节,到凌云处也虚心。”如今,当人们再次步入锦时江,川菜大厅门扉依旧,店徽——竹——依然如昔;再品锦江烤鸭、银丝干贝、棒棒鸡、水煮牛肉……麻、辣、鲜、烫、酸、甜、苦、寒、香、脆、椒、咸……味蕾泛起的,是不是百味杂陈的自由人生?

望江楼上望江流,
人自望江江自流;
人影不随江水去,
江声不断古今愁。

■德鲁克在中国

“我感受到了自我经营的快乐”



黄建东

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培训总监

海尔洗衣机海外产品经理崔淑立接手美国市场时,大家都说下个客户非常难,因为前任各产品经理在这个客户面前都业绩平平。

一天,崔淑立一上班就看到了这个客户发来的要求设计洗衣机新外观的邮件。因时差12个小时,此时正是美国的晚上,崔淑立很后悔,如果能即时回复,客户就不用再等到第二天了!从这天起,崔淑立决定以后晚上过了11点再下班。

三天过去了,崔淑立与客户及时沟通,开发部很快完成了新外观洗衣机的设计图。就在决定把图样发给客户时,崔淑立还必须要配上整机图,以免影响确认。当她“逼着”自己和同事们完成“日清”——整机外观图并发送给客户时,已经是晚上12点了。大约凌晨1点,崔淑立回到家,立刻打开电脑,当看到客户回复:“产品非常有吸引力,这就是美国人喜欢的。”她高兴得睡意全无,为“夜半日清”有效果而兴奋不已!

样机推进中,崔淑立常常半夜醒来打开电脑看邮件,可以回复的就即时给客户答复。美国那边的客户完全被崔淑立的精神打动了,推进速度更快了,这个客户的第一批订单终于敲定了!

市场没变,客户没变,拿大定单的难度没变,变的只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人——崔淑立。

日清工作法是海尔的创新,是海尔结合企业实际,在目标管理实践中一个的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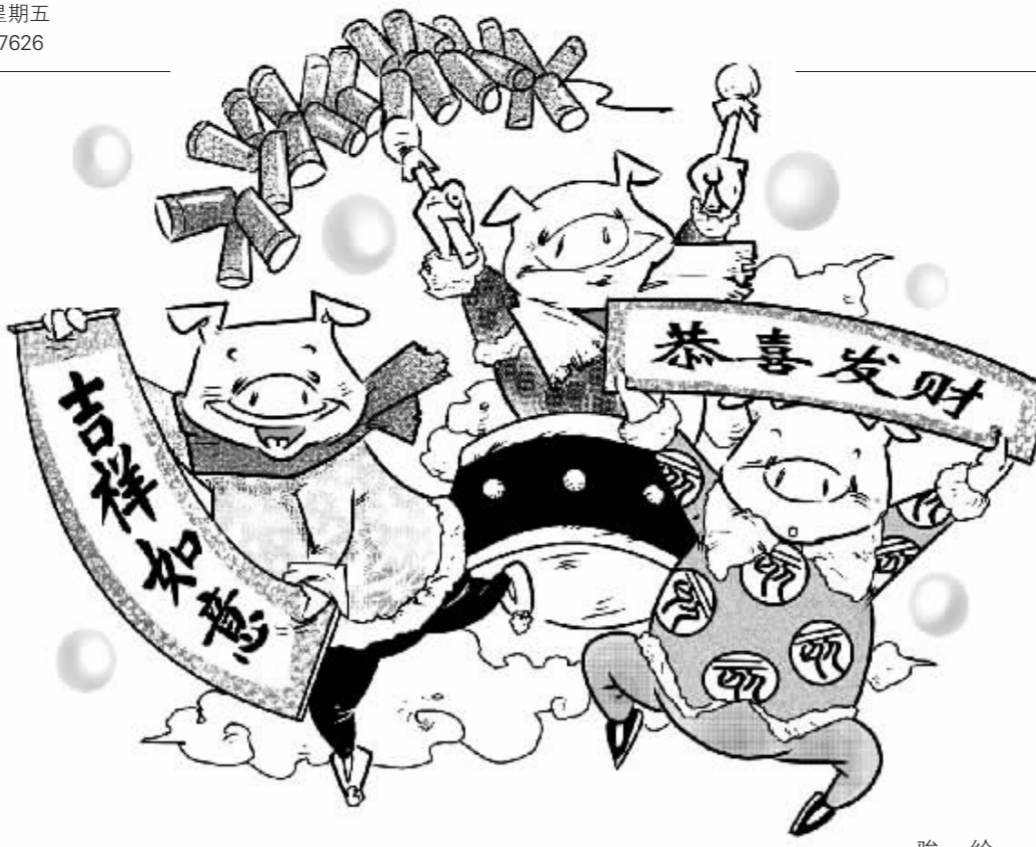
为什么崔淑立能够这样工作?其回答“因为我从中感受到的是自我经营的快乐!”给我们出了一个管理上的大题目。

德鲁克在谈到管理的三大任务时说,管理的一项任务就是要使工作有成效,使员工有成就感。目标管理使崔淑立有了成就感,有了快乐。

管理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猫在主人吩咐下到屋子里抓老鼠。几个奔突来回,到底也没有抓到。后来老鼠一拐弯不见了。主人看到这种情景,讥笑道:“大的反而抓不住小的。”猫回答:“你不知道我们两个的‘跑’完全不同吗?我仅仅是为了一顿饱饭,而它却是为性命而跑啊!”

几乎每一个管理者都要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企业中建立一种机



骏一绘

众在潜意识中如此来理解、使用“封建”时,公众也同时完成了自己的显意识的构建——希冀圣明天子,青天大人,热播了一阵子的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康熙微服私访”,特别是“生死抉择”引起全国电视观众注目,或可为此研判的一个例证。换一个说法,观众心目中的“封建”,就是这么一个模样,一点也不矫情。从经济角度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是靠不住的;术语的封建与熟语的封建在这里合二而一了。极而言之,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场“封建幻影”。学者们也许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但中国共产党却意识到了这一点——力图寻求实现公有制的市场经济形式。也就是说,即使仅仅在经济意义上讲,现代中国的“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格外艰巨。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国有经济为什么要进行战略性调整或改革?条块分割、部门垄断、地方封锁、行业禁入,有法制而无法治,产权虚置、上下交争,中央地方博弈、强领导弱管理

■一个人的宇宙

看不见的收成(续)

上一次,我在本专栏里提及北京的普通市场买不到国内不少地方的优质水果,那时我抱怨着“涪溪”标记的柚子往往难以入口,没有这个标记的反而鲜美怡人——尽管“涪溪”柚是古时贡品,又是现在名优农产品的注册商标。这次口福很好,又买到一次好柚子。怎么鉴别?实在不好意思,我也不懂,只是凭借经验,特别留意没有“涪溪”标识的漳州柚,然后——挑贵的。同一个市场里的“涪溪”柚虽然像模像样地标有种植者的手机号码,仿佛专门定制,也只有2元一斤,那么要价2.5元的非“涪溪”柚,不就值得买回去一试吗?

果然如此。这一次,是托了价格差异的福。但这经验换个场合也许就适得其反,假如家门口的菜市场里所有的草莓都是一个地方批发的,其中最贵的标价10元,而另外一家超市里的草莓标价15元,想从中挑选出更好的来,恐怕只能做做好吃一餐长一智的准备了。我们可以自以为了解标价12元与3元的OralB牙刷所存在的细微差别,但面对每一批都可能来自不同产地的水果,眼睛又看不出明显的差别时,能做出什么判断?——这时,只能假设水果的品质都是一样的,然后选择价格最低的——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习惯。

所以,当水果种植者抱怨他辛辛苦苦培育的优良品种在北京卖不上价格时,未必是因为北京来的批发商盘剥过甚,也未必是因为北京的消费者收入过低。很可能是因为消费者实在是没有办法预知其品质,因而只能参照较差的品种来报价。

假如你和我一样,有在小城镇生活过的经历,你也许会

■大局

从董竹君说到现代中国的“反封建”



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二十世纪奇女子董竹君,1900生于上海,父亲是洋车夫,母亲是洗衣女佣。13岁时为替父母还债,沦为青楼歌女。14岁逃出火坑,与革命党人夏之时东渡日本,后贵为督军夫人。因不满父权夫权统治的封建家庭桎梏,29岁时毅然出走,抛弃富贵荣华,白手起家,独立抚养四个女儿,被誉为“中国的娜拉”。35岁时在友人资助下,创建了锦江川菜馆,先后接待过杨虎、杜月笙、陈毅等各色人物,董竹君也以其特殊身份曾

为共产党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事。1949年后,原华懋公寓改建高级饭店,将全部资产捐赠予国家,成了“红色资本家”的董竹君出任老总,店名沿用了锦江川菜馆老招牌,这便是今日上海滩著名的锦江饭店。

上海“锦江饭店”之名号,缘于董竹君对老成都东门外“望江楼”割不断的情缘,缘在其夫君夏之时乃辛亥秋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著名将领。古时成都,因盛产锦缎(蜀锦)又名“锦城”。据说,锦缎在环绕锦城的江中濯涤后光彩异常,是为“锦江”。锦江河畔的望江楼因唐代女诗人薛涛而著名,乃蜀中名胜之一,同时又以修竹繁茂竹品奇绝而蜚声四外。苏轼有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一生爱竹的董竹君,立志在上海滩开设川菜馆,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锦江”二字。上海锦江从不依附黑社会恶势

■长短集

少了喧闹 多了平和

——台北所见



晓晓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初见台北,与我的想象多少还是有些差距。一则台北这座城市并非是高楼林立,喧闹异常,而是多了些平和,多了些宁静;二则所见所遇的市民自律性较强,内敛中透出谦恭,包容中透出强烈的道德感。客观地说,在台北,东方的儒雅气质和西方的务实特点被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别致的地域文化色彩。

如果仅仅从经济发展速度上看,台北是不能与大陆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同日而语的。如果从城市的面貌特征上比较,台北或许也不如大陆这些城市;但是,如果从城市的品性和内涵上看,大陆的这座城市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修炼。古人云:内外兼修,方得正果。城市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呢?也许,一座硬件条件优良的城市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球,但这种吸引只是眼热和冲动,当你熟悉以后,或许就会产生审美疲劳,并发现很多的内在缺陷,以至厌倦或者保持隐忍冷漠。与此相反,一座软件良好的城市,也许它的硬件不足以吸引你的眼球,但当你真正体验和感受到它的品性以后,它会让你长久地惦记。当然,我这里的城市软件条件指的是和谐的人际关系、极具包容性的城市民风、某些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灵的城市传奇。我知道,在大陆,不少人会把济南视为这样一个范例。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北在本质上是一个移民城市。也正因此,台北的包容性很强,并且在东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下,大多数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都与西方国家相似。人与人之间在保持执著、务实态度的同时,又不乏人情味。一些显见的现象是,人们的生活秩序井然有序,上公交车时会自觉排队等候,公共场所看不到置他人于不顾而抽烟的现象,相互之间的口头交流细声细语,不温不火。

许多时候,人们总是会拿中国人口太多来搪塞自己在软件上的落后。当然,我并不否认人口多是大陆许多城市环境变得恶劣的一个原因,但人多并不是确切的内因。记得一位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曾经说过:把人口过多看作是中国经济社会落后根源的根本原因,是幼稚而可笑的。原因是,与50年前相比,中国人口至少翻了一翻,但中国的经济总

量和发展能力却在显著增强。反过来讲,中国的人口规模恰恰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一则可以增强政府的自律意识,促使它们更多地为国家未来的命运思考、谋略;二则适当的人口规模是确保分工水平的关键因子,缺乏一定的人口数量就意味着需求能力的有限,而有限的需求能力是难以支撑经济顺畅发展的。

当然,伴随着大陆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一些城市在软件环境上的恶化也在情理中。试想,在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获得机会的条件下,非文明的行为方式就成为了生存的唯一之道;在民众默默对待非文明者野蛮行为的情况下,文明行为和文明者反而成为“过街老鼠”;在政府“三令五申”制止不文明现象而无显著提高的前提下,文明规范就被非文明规范完全取代。其实,前两年大陆兴起的“国学热”就是呼唤城市文明复归的一个信号。当前,中央政府适时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破除不文明陋习以凝聚城市文明精神似乎也到了关键时刻。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当务之急的问题在于如何提高个人的社会良知。方法有以下几个途径:一启动新全民教育。让所有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力,尤其是在一些贫困的山区或者经济力欠缺的地区更应该给予充分的教育,在这一点上,政府应该义无反顾的给予资助、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新全民教育的方式要灵活多样,不可形式化。二改良现行各学校进行的思想教育课程,给予学生更多的社会实践课程,给予学生更多的社会实践课程,比如,组织学生体验盲人生活,为学生设置文明账户或积分卡;同时,要督促学生对自己家长的行为约束。三加强制度的约束力,抓住一个罚一个,以警示他人。无论如何,文明道德行为绝不是一件小事,它在小处可以体现为一个地区的民风,在大处则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国威。在市场经济的旋涡中,绝不可轻易地认为物质实力是衡量个人价值的终极标准,为确保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把遵守社会公德作为赢得他人尊重的原则确立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件。